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冷戰後亞太地區中國的軍事與經濟崛起、日本邁向正常化大國的意識，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互動，成為研究國際政治所關注的議題與焦點。在這些議題發展的導引下，中日兩國成為亞太地區具有重要引導地位的國家，伴隨著中日兩國影響力的擴大，亞太地區也逐漸成為世界戰略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地區。身處於亞太地區兩大強權的中國與日本，其關係之重要性可以想見，不僅僅關乎亞太地區經濟及戰略的重要議題，更將是牽動整個世界局勢發展的重要因素。

中共政權從成立以來，其外交政策方針經歷了幾次的調整，配合著總體情勢的轉變而有所不同。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外交手段逐漸的從僵硬轉變為靈活，研究中國外交的學者們，也不斷的發展各種途徑，來解釋與分析中共的外交政策。這除了為中共外交政策及行為提供合理性的解釋外，更希望的是能提供一個脈絡性的分析，以免對中國的崛起以及軍事擴張產生錯誤的預估。

在中共外交政策調整的過程當中，民族主義往往扮演一項重要的心理因素，這根源於中國建立現代意義的國家以來，人們心中所潛藏的巨大不確定感，因而才會藉助民族主義來替新近建立的主權國家，打下一個穩定的心理基礎。¹在這種心理基礎上，使得中國人在面對鄰國時，往往顯現出巨大的不安與威脅，特別是日本具有侵略中國的陰影，中國人根據這種印象，來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從而使得日本在中共的對外政策假設當中，若是有擴張的跡象就會容易被解讀為將對中國產生嚴重的威脅。²正因為中國具有的獨特的歷史情境，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時，也就必須考量這些因素，民族主義對於中國來說，並非如同西方學者將

¹ 石之瑜，*民族主義外交的困境*(台北:世界書局，1995年9月)，頁148。

² Germaine A. Hoston, *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

它當作一個政策目標一般，³而必須從中國歷史脈絡來看，似乎才能深刻的理解其在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呈現上升的動能，是一種時代變動下的產物，中共自從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其自身的變化和發展就一直與整個世界密不可分，冷戰結束所導致的國際環境轉變，加上中國改革開放所累積的國內種種困境，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危機與壓力，是造成冷戰後中共訴求於民族主義的基本根源。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既然是對國際及國內環境的反應，其影響力自然也就將擴及國際及國內層面。因此，民族主義要如何影響中國對外關係，取決於他國如何對待中國；⁴相反的，中國國內民族主義的提高，想必也會增加其他國家的壓迫感，冷戰後的中日關係似乎正是陷入這樣的困局當中。

冷戰後中日關係的發展，套句研究中國外交的人常會說的：「中日關係是中國外交中一項敏感與關鍵的問題。」中日關係的轉變，從中日建交以來，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經濟議題」是中日關係的主要支柱，這一時期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1980 年代末「政治議題」取而代之，雙邊關係進入不穩定時期。後冷戰時期中日之間則重視「戰略關係」，雙邊關係進入了更新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⁵導致中日關係之中敏感與困難的因素，除了國際局勢的變動之外，主要在於兩國之間具有深厚的歷史與民族情感上的糾結，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爭議加上民族主義所形成認知上的偏見，將可能在特定時期變成影響中日關係的重要變數。中日雙邊關係發展的變化，既有外在國際局勢改變的因素，也是內部兩國各自發展的影響。在這其中物質性利益固然具有重要的角色，可以使雙邊互動在既有的建制與規範下運行，因而顯得較為平穩；但往往當物質性利益遭遇到瓶頸或是其他依些因素的作用，精神性的民族情緒，也有可能取代部分的物質性利益，使得雙邊關係變得更為敏感與復雜。

³ 石之瑜，*民族主義外交的困境*，頁 149。

⁴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 1995), p.291.

⁵ 徐之先，*中日關係五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1-3。

隨著如今中國發展的藍圖與規劃當中，已經有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從世界工廠，成為世界品牌的話語出現。可見當今 21 世紀的前景，中國崛起的議題，將有可能逐漸的從韜光養晦，走向有所作為。目前中國在民間不論是媒體以及知識份子，更是廣泛的描繪著這一個世紀的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的圖景，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的提升由此可見。儘管對於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已經招來了眾多的評論，但是人們所關心的大都是想要對民族主義的未來作一番預測，卻往往忽略了它興起的內涵以及原因。因此，若不能深刻了解其中的內涵與形成背景，將可能會對民族主義的分析形成一種誤解甚至是偏見。⁶

隨著中國崛起所產生更強大的民族主義動能，不但將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因素，更是影響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的一大變數，有鑒於其重要性，因而呈現出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具有什麼樣內外環境的因素，藉由分析其興起的背景與內涵，才能對民族主義影響的政策層面有更周延的了解。
2. 冷戰後中日兩國民族主義均呈現上升的狀態，並且有逐漸傾向對立的趨勢。探討此問題除了從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來看之外，亦須探討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發展，以及雙方的互動趨勢。
3. 藉由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展現的不同風貌，探討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的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層面產生的影響力與作用。
4. 民族主義訴求以及中國與世界接軌是冷戰後中共政權所面臨的一項矛盾在，中共的對日外交政策在民族主義的作用下，也往往會因而陷入一些矛盾與困境當中。中共在當今的對日外交戰略規劃當中，如何因應這些轉變與持續，不只將影響日後的中日關係發展，更將是外界觀察中國崛起能否和平的一個角度。

⁶ 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2001 年 4 月)，頁 433-434。

第二節 概念界定

民族主義是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亦即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如何成爲影響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中的變數。而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首先必須要了解的就是民族主義的概念，民族主義研究如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並無存在一個絕對的典範，隨著區域或是歷史情境的不同，也會產生出不同的解釋途徑，因而在此將探討民族主義研究的歷程，釐清民族主義研究的主流概念，並進而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情境，藉此奠定本論文的基礎。

一、 民族主義的概念

從全球角度以及時間的向度來看，20世紀民族主義出現過三次浪潮，簡單來說，第一次浪潮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二次浪潮表現爲世紀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進程；第三次浪潮則在世紀之末與蘇東劇變同時出現，造成國際格局的又一次巨大變化。⁷經歷了三大浪潮，民族主義在概念上，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學科的整合，不斷的擴展其內涵，要定義民族主義以及將它應用於各個國家的發展情境，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但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說，西方對於民族主義的研究歷程，仍然提供了我們研究的基礎和架構，只是若要更深刻的分析各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發展，就必須考量各個國家所具有的具體歷史情境。

三次關於民族主義的研究高峰，一方面反映著二十世紀的歷史現實，另一方面則是反映著空間上的擴展，由西方擴展到非西方。而在民族主義的內涵上，有鑑於民族主義的起源的不同，所呈現的面貌也大不相同，大致呈現出三種面貌：⁸

1.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主要強調的是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特別是工業化過程)的關連性，以及和過去歷史的連續性。這方面代表性的觀點，如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在《民族和民族主義》一書中，認爲傳統封建式的忠誠網路在工業化社會強調促進社會流動與自我競爭力的情況下顯得過時，因而

⁷ 羅志平，*民族主義理論、類型與學者*(台北：旺文社出版社，2005年2月)，頁61-64。

⁸ 同上註，頁397。

需要一種新的文化團結源頭，這正是民族主義所能效勞的地方。⁹而安東尼·D·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則認為現代民族與前現代族群共同體中具有連續性，民族是被框築於歷史之中，他們的存在是立基於共同的文化遺產和語言。¹⁰基於以上的認識，文化民族主義一般指的是以民族自我肯定的方式出現，這項意涵就是透過民族尊榮與自尊的提升，使人們獲得較清晰的自我認同感。

2.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主要的著眼點在於強調公民的政治順從以及政治的合法性層面，而非文化的認同。因此主張政治民族主義者，往往認為民族立基於歷史連續性或文化純淨性根本是一個神話，民族主義本身創造了這類的神話。如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認為民族是政治菁英所發現的傳統之一，其目的是在一個世紀以來的民主化與革命中合法化自己的權力。¹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則形容現代民族是人類所刻意創造出來的，他將之稱為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¹²黑格爾的名言則可以做為這種見解的典型，他說：只有形成了國家的民族才具有更高的品格；民族不是為了產生國家而存在，民族是由國家所創造。
3.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1970 年代開始，開始關注於對新興國家的民族主義研究，在這一波民族主義研究高潮中，加入了一批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在他們的解釋當中，特別強調經濟的因素。如赫克特 (Michael Hecter) 提出的內部殖民主義 (Internal Colonialism)，強調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將會造成那些較不先進的人民越有可能處於團結的狀態，以抗拒政治上的差別待遇。¹³江森 (H·G·Johnson) 研究當代新興國家民族主義，由經濟學出發，發現新興國家中民族主義可以趨使這些正在發展的國家藉經濟計劃而加速國家發展，

⁹ Ernest Geller, *Nation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3.

¹⁰ Anthony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71), pp.5-6.

¹¹ E. J.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 (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頁 5。

¹²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 (台北:時報文化，1999 年)，頁 2。

¹³ Michael Hec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15.

以爭取民族尊榮。¹⁴

綜合來說，吉布諾（Montserrat Guibernau）在對民族主義理論研究的歸納，將之區分為三大類，即(1)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強調民族的基本特徵；(2)強調現代化的需求、新型溝通的發展與經濟因素；(3)心理學理論，即個人對集體認同的心理需求，強調的是感情與某一團體的觀念層面，而非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¹⁵而在三大類當中趨於主流的解釋概念，主要集中在第(2)及第(3)類，意即政治菁英、現代化、文化結構、經濟因素與民族認同等，是目前解釋民族主義的主流概念。

在描述了 20 世紀民族主義研究的幾個方向之後，以下將對民族主義的特性做一些大致的歸納來理解民族主義的具體內涵。首先，李英明認為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根源具有很大的關連性，而這展現出兩種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訴求：¹⁶

1. 國家民族主義：承認再一定領土範圍內的種族差異性，但要求各種族通過集體效忠來形成一個具有集體意識的國家，並進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這是一種多民族國家的操作模式。
2. 種族民族主義：通過要求某一種族在政治上獲得自主性甚至進而組成一個國家，藉以突顯種族的政治角色，這種要求單一種族由遺傳、生物上的族群角色轉變為政治角色的過程，是一種單民族國家的操作模式。

邵宗海教授在對民族主義研究時所整理的理論內涵，則認為民族主義雖然在定義上可能較為複雜，但是在內涵上具有下列不同層次的定位：¹⁷

1. 民族主義是一種過程：一群人基於相同的特徵結合在一起，為了生存抵禦外

¹⁴ Johnson H.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New and Developing States",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L, No.2(1965), p.169.

¹⁵ Montserrat Guibernau 著，周志杰譯，**無國家的民族：全球時代的政治社群**(臺北市:韋伯文化，2002)，頁 1-3。

¹⁶ 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生智出版社，2002 年)，頁 111-112。

¹⁷ 邵宗海，「民族主義與中山先生思想」，台北:**海峽兩岸中山先生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1995 年 1 月，頁 10-11。

侮，組成政治團體，進而建立起國家的一段過程。

2. 民族主義是一種認同:民族或團體的成員必須有忠誠的義務，而且對其所屬有強烈的歸屬感。
3. 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或概念:國家利益必然種於個人，而且必須去積極維護意識或概念。
4. 民族主義是一種有系統邏輯的思想體系，它提供一群人或團體在追求獨立建國或是富國強兵時的導引。
5. 民族主義具有主權在民的精神，讓人民忠誠的對象是國家或社會，而非君主。
6. 民族主義具有自由與平等的內涵。
7. 民族主義強調個人與民族、個人與國家，以及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8. 民族主義在強調宗教、語言與文化的同類外，更鼓吹人民總意志的重要性，認為唯有上述條件才能凝聚民族情感。
9. 民族主義就是追求國家更強更富，特別是在帝國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興起後更見這方面的目標顯著。

綜合而論，我們可以發現民族主義在概念上盤根錯節，但是從以上的定義來看，我們還是可以抽離出民族主義的一些結構因子:民族主義的發展是與西方現代化過程高度相關，它具有文化與政治兩種對立的特性，他可能是由下而上的文化與傳統所形成，也可能是由上而下為統治菁英服務的工具。新興國家的民族主義，則大多呈現經濟民族主義形式。而雖然民族主義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模式不同，不過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立的互動關係卻是分析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座標，因為它能由此產生各種不同的民族整合與國家建造關係。以下將透過探討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以及與民族國家建立的互動關係，希望能藉此釐清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具有的內涵。

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的產生是二十世紀推動中國歷史的一大動能，不論民族國家建立之前或是民族國家建立之後，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以下將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以及共黨所詮釋的民族主義如何獲得主導地位來觀察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所呈現的內涵。

(一) 中國民族情感的產生

中國自 1840 年以來深受外國入侵的恥辱經驗，是中國民族情感肇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是一般學者大致同意的看法。而綜觀這一段歷史，民族主義的發展很大部分是基於打造一個正常國家，以及對抗外來入侵為目的，因應這些歷史情境需求而出現的人為產物，因此中國民族主義在起源或是內涵上，很大程度都是為政治所服務的，如同上述安德森及霍布斯邦對民族主義的觀點，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具有相當大的想像及創造的意涵。John Fitzgerald 就認為中國的近當代國家政權透過不斷地改變國家的定義，以及民族主義的內容，塑造人民的民族意識。他認為公民、種族或階級的國家概念都是國家政權所製造出來的。¹⁸

至於如何塑造人民「國家」的概念，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正好為菁英們提供了民族主義情緒抒發的管道。雖然事實上，中國積弱的主要原因並不單單只是歸咎於外在因素，其內部制度運作的窒礙難行與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爭奪也是重要的關鍵。然而近百年以來，中國人總是把自身的貧窮與積弱歸罪於外來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壓迫，無論是孫文、蔣介石或是毛澤東、鄧小平都如出一轍。傳統的歸罪論以挫敗感（frustration）來解釋敵對情緒的產生。政權因目標達成遇到障礙所產生的挫敗感，受到社會道德的支持，便會產生敵意，並將此敵意轉移至第三者，使其成為替罪羔羊。¹⁹Lucian W. Pye 就明白指出，不同於其他轉型社會是以聖雄式的訴諸或英雄式的榮耀來賦予民族主義特質，中國的政治領導人試圖以真實與想像的方式來描繪中國來自於其他國家的屈辱，藉著這種方式，才會使民眾對於這些造成恥辱的國家有恨意，自我的恥辱感也會因為對這些恥辱製造者的

¹⁸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90.

¹⁹ 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書局，1988年5月），頁12,16。

羞辱而有所克服。因此就國家情感而言，心理層面的考量比客觀事實來得重要。

20

中國百年來的反帝國主義情緒就是在這種情結之下產生，這樣的歸罪之所以能產生強大的動員效果，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長久以來的文化優越感，以及與外界缺乏互動所形成之今昔之間的強烈心理反差。而這種心態縱使到了中共建國後逐漸轉變，但也由於官方民族主義的不經意挑動與政治社會化所帶來的價值傳承，使得這樣的歷史觀得以持續和發酵，並對於官方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二) 中共對民族主義的詮釋與運用

中國民族主義情感誕生於中國的積弱不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菁英們都注意到了民族主義在國家建設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展開了中國政治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在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當中，區分敵我的民族意識是激發人民的重要因素，但除了民族意識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透過民族國家的制度來保障，因而這也就成為當時國共兩黨活動的主題。²¹而民族國家制度該如何建立？孫中山認為中國自滿清皇朝被推翻之後，並不存在現代意義的國家。沒有這種國家制度，民眾的民族心理即使產生，也不會長久。因此，孫中山認為要創立一個民族國家，首先必須先建立一個黨，再由黨來創造民族國家制度，這一思想觀念為國共兩黨所繼承。因此，國共兩黨的鬥爭也是為民族國家的建設而鬥爭。

在國共鬥爭的過程中，共產黨能取得勝利建國，對民族主義的詮釋獲得支持是重要的因素。正如 Joseph Whitney 指出的，國民黨政府沒有能發展出為普通人民所理解接受的國家思想（state-idea），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國家思想是針對各層菁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中國人民的。作為一個統治黨，國民黨只強調權力的集中性，不容許來自下面的政治參與。國民黨忽視了當時人民主權的概念對很多中

²⁰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New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71-73。

²¹ 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局, 1998年8月), 頁154,161。

國人，特別是對知識份子具有相當大的感染力。²² Joseph Levenson 則指出，除了知識份子的因素之外，國民黨政府因為走的是城市中心的路線，缺乏有效的工具能將國家建設思想傳達給中國社會的最基層。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侵華，使得共產黨的動員式民族主義顯示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²³ Franz Schurmann 更認為組織和意識形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他說共產黨中國猶如一由不同磚石所打造而成的大樓，它被揉接在一起，站立著。把它揉接在一起的就是組織和意識形態。²⁴中共在民族主義的光環之下壯大，其所詮釋的民族主義也因貼近廣大人民而能戰勝國民黨，這既是歷史的偶然也是必然。

中共所詮釋的民族主義內涵，最為重要的就是「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二者均誕生於 1945「七大」新黨章總綱中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一切工作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從此之後，中國共產黨真正的發展出了因應中國歷史情境的革命道路，透過「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把民族、國家、階級結合起來，形成一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學說。²⁵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前者則是各種矛盾當中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矛盾，才使得中國社會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狀態。²⁶透過中共菁英的詮釋，中國境內的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對於外國的威脅有了不同的敵意思象。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階級似乎也成了民族成員資格的唯一判準，左派菁英透過不斷的歸罪與詮釋，也賦予了亡國不同於過往的意義:其試圖將人民過去改朝換代的史觀扭轉為特定的線性史觀，在這樣的史觀之下，使得國

²² Joseph Whitney, *China: Area,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t. of Geography, 1970), pp.56-59.

²³ Joseph Levenson, *Modern China and its Confucian Past*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Inc., 1964), pp.35-37.

²⁴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1.

²⁵ 董立文，「90年代中共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論文(1997)，頁39--40。

²⁶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頁623。

家滅亡等同與整個民族的滅亡，人民是無法生存於滅族之後的。²⁷

綜合上述中共的歷史經驗，把民族、國家、階級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所詮釋的民族主義獲得廣大支持的利刃，而在取得民族獨立地位之後，這個利刃同樣可以為鞏固政權而服務。因此，中共建國之後，領導人仍經常動員民眾的民族情緒，來達成經濟或是政治上的手段，而政府也可運用組織的力量去淡化或是調控民族情緒。這也使得官方發明創造的民族主義，一直扮演著中國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力量。²⁸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論文在文獻回顧的部分，將探討冷戰後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並試圖對民族主義與中共外交政策的關連性作一番釐清與整理。而在文獻分析中所必須注意的就是中日間的民族主義對立，是一種精神性的表現，因此產生許多情緒性的論述，要身處於那種歷史情境當中，似乎才能深切感受。若是要透過各項文獻資料來探討，難免就牽涉到價值是否中立的問題，因此本論文在研究中的資料搜集整理及推論過程，將盡力克服限制，力求研究與事實現象結合。

一、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

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儘管愛國主義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但是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仍是相當敏感的話題，因此一旦人們想要對民族主義進行分析的時候就會發現，儘管民族主義已經形成一種強烈的思潮，但是真正試圖分析民族主義的成文文本卻是極為匱乏，民族主義的探討往往是以極為曲折而隱諱的方式來表達的。直到 1990 年代初期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危機，民族主義的思潮再一次的扮演凝聚中國的力量，中國學界對於民族主義才又再度的興盛了起來。以下將從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特色，來探討冷戰後關於

²⁷ John Fitzgerald. (1996), pp.60,62.

²⁸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46.

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

(一)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

1. 冷戰後首波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探討

冷戰後首先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探討，主要關注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以及蘇東坡的遽變，導致中國面臨了國內以及國外的種種壓力，而一些偏向於官方立場的刊物與作者，也就開始為這時期所面臨的危機尋找出路。因此，首波探討民族主義的文本主要偏重於探討民族主義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連性。

- (1) 何新 1990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世界經濟與意識型態一文當中，在不觸及官方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認為要以民族主義來強化現有意識形態。何新的論述在特殊的時期，在特殊的報紙上發表出來。這也就不能不賦予這個談話極強的意識型態色彩，因此，何新的這個談話錄，可以作為是最早的發表主張民族主義的文本。²⁹
- (2) 1991 年 9 月，一篇名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報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義」傾向的某些思路，也讓我們得以窺探天安門大屠殺與蘇聯解體給中共政權帶來的震撼。該報告的作者明確提出，要以國家民族主義來填補官方意識形態衰落導致的信仰真空，運用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從而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³⁰
- (3) 蕭功秦在 1994 年〈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的「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期的意識型態」一文當中，則是明確提出了民族主義作為今日中國意識形態之必要性。他認為將民族主義整合進官方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不是建議而是現實。在文章中他列舉出了鄧小平的話“我是人民的兒子”、台灣問題

²⁹ 祖治國，**90 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台北:致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頁 140-141。

³⁰ 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編，「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北京之春**(北京)，1992 年 1 月號。

的重要性、國家領導人參加漢民族神話遠古祖先的祭祀、在學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等，以此論證民族主義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回潮。³¹

上述的一些作者與刊物，大致都具有一些官方的背景，因此首波關於民族主義的文本探討，主要偏重於官方的立場闡述，這也反映出官方對於民族主義的詮釋，似乎扮演著領先與主導的地位。至於學術界廣泛的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則從 1992 年中國威脅論的提出，以及 1993 年杭亭頓接連在〈外交事務〉發表文明衝突的文章傳到中國之後，〈二十一世紀〉、〈戰略與管理〉、〈中國社會科學期刊〉、〈東方〉、〈讀書〉等雜誌均用相當的篇幅發表了有關的討論文章。³²民族主義的關注焦點也就開始真正的深入到文化層面，許多知識份子也以對中華文化的懷舊，來對抗西方文明，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探討成爲一項熱點，許多學者也紛紛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來分析後冷戰時期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

2. 對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原因的探討

學界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原因，大致上主要從國際及國內環境的變化來看。偏重於國際環境因素的分析，主要關注的焦點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與國家戰略利益調整的選擇以及綜合國力的增長與西方國家的打壓之間的矛盾。如民族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小東認爲民族主義的興起的原因是中國正在作爲地區乃至世界性強國崛起，由於政治制度與西方主流國家不同，兼之對世界資源的消耗急劇增多，由此受到西方主流國家的擠壓是一個長期的且不可回避的現實，並認爲自豪感和受擠壓感是民族主義產生的基本要素。³³任炳強則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於中國民眾在外交領域產生強烈的挫折感及中國政府重建內部合法性的需要導致中國民族主義再度興起。³⁴孫立平認爲民族主義思潮在九零年代興起的深層原因在於，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對

³¹ 蕭功秦，「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戰略與管理*(北京)，第四期(1994年4月)，頁56。

³² 祖治國，*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頁140-141。

³³ 王小東，「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戰略與管理*(北京)，第5期(2000)，頁73-75。

³⁴ 任炳強，「中國民族主義重新興起的原因特徵及其影響」，*學海*(北京)，第1期(2004)，頁80-82。

象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衝突頻繁發生；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復蘇。³⁵張豐清則將焦點著重在全球化時代，針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提出了全球化時代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的基本方向，即構建既反對霸權和全盤西化，又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溫和的、理性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³⁶而偏重於國內環境因素的分析，主要關注的焦點傳統意識形態功能的弱化與政府合法性重建的需求，如前述的一些站在官方立場的學者。Jonathan Unger 認為中國政府在尋求新的合法性上，民族主義是一項利刃，而中國政府在操控民族主義上並不比其他國家遜色。³⁷

而從綜合國際及國內的因素來看，房寧認為是民族主義的歷史記憶，國內社會生活實踐的改變，不合理的國際利益格局及尋求政治正當性的衝動。³⁸學者吳國光則認為 90 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有更多的原因是因為中國通過了改革開放而取得了相當的經濟成功。中國正在崛起為世界大國，而世界秩序依然由西方主導。他認為 1990 年代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並不是什麼政治或知識的懷舊現象，而是目前中國本身轉型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轉型的反映。³⁹

董立文在對九零年代中共民族主義的分析當中，則引用了諾布(Norbu)的民族主義分析模式，諾布認為民族主義有三個主要的成份，即政治理念（或是意識形態）、經濟利益與傳統（傳統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處於危機中的運動，使得這三個成份結合在一起而形成一個複雜的複合體。如下圖所示：⁴⁰

圖一、民族意識的構成圖

³⁵ 孫立平，「匯入世界主流文明」，*東方*（上海），第 1 期（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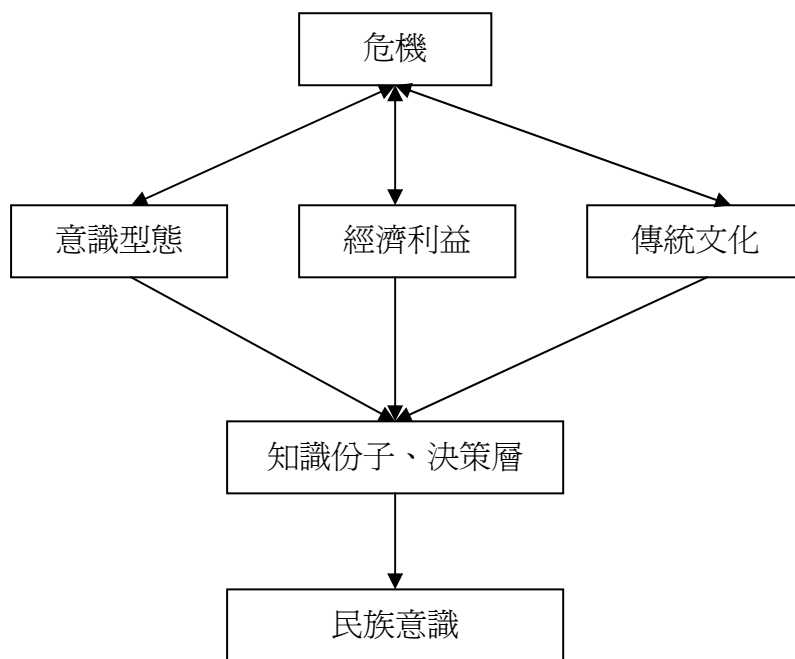
³⁶ 張豐清，「全球化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與構建」，*武漢理工大學學報*（北京），第 17 卷第 3 期（2004 年 6 月），頁 364。

³⁷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2.

³⁸ 房寧，*民族主義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頁 39。

³⁹ 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317。

⁴⁰ 轉引自董立文，「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18。



資料來源: Dawa Norbu,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London: Routledge, 1992), pp.27-28.

基於以上的認知，董立文認為中共民族主義在後冷戰時期興起，應從中國的危機情境來觀察，在這危機情境之下，將會造成意識型態與傳統文化的融合，進而與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利益困境相結合，影響中國的領導階層以及知識份子，一個階級一個階級的逐步傳播，最終將遍及整個社會而形成政治意識。⁴¹

通過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研究綜述學者們的總結，可以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作以下概括：民族主義的興起具有國際及國內因素，而國際以及國內因素將會構成中國的危機情境，導致政治理念（或是意識形態）、經濟利益與傳統（傳統文化）與民族主義產生互動結合，進而影響形成人們的政治民族意識。這也符合了 James Townsend 的觀點，他認為今日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多層次的複合體，包括政治民族主義、漢民族認同以及文化主義自豪感，所有這些情感都被本世紀更迭的中國政權部份或重新塑造了。⁴²

二、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內涵

⁴¹ 董立文，「90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19。

⁴²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60, 62.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學界關心的另一個焦點，就是它展現出什麼樣的內涵及特點，與過去有哪些不同之處，進而又產生什麼樣的歷史作用。關於後冷戰時期中國民族主義具有什麼樣的內涵，鄭永年在《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一文當中，就認為要區分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和大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這兩方面，才能比較確切的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⁴³以下將從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內涵，以及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所具有的歷史作用來分析。

(一) 官方民族主義與民間民族主義

關於官方的民族主義論述，主要偏重於愛國主義觀念的灌輸，比較具有理性的成分，一方面須鼓勵愛國主義，另一方面又需要壓制過於激烈的民間民族主義。官方的民族主義論述，則主要體現在愛國主義實施綱要以及領導人的言論中。

而民間的民族主義論述則往往是情緒性的反應，帶有非理性的成分，在任何一个國家都是存在的。在中國這種情緒的根源主要來自歷史中的強國情結(state-strong-omplex)以及受害者心態(victimization narrative)，這兩種情結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歷史經驗，也是最初中國民族主義誕生的記憶。⁴⁴而在80年代之後，或者是西方的價值再度的進入，因而產生認知上的矛盾；又或者是官方利用歷史題材進行政治社會化，因而使得民間的民族主義論述一方面強調建立富強國家的期盼；另一方面則又重拾過去歷史仇恨的老路，在這種氛圍下因而也產生許多情緒性極為強烈的著作與行動。⁴⁵中國學者任炳強就認為這一波民族主義論述，是相當具有情緒化的傾向和內容的空洞性。⁴⁶

至於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方面，官方佔有主導的地位是受到大多數學

⁴³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收錄於鄭永年、林佳龍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 433-434。

⁴⁴ Peter Hays Gries.(2004), p.49.

⁴⁵ 如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下中國的陰影等書。

⁴⁶ 任炳強，「中國民族主義重新興起的原因特徵及其影響」，**學海**(北京)，第 1 期(2004)。

者同意的。但Peter Hays Gries則認為，民間的論述正逐漸的取代官方的論述，因為雖說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喜歡從過去歷史創痛中尋求論述的道德合理性，但這種方式卻意味著必須直接面對自己的軟弱無能；也因此，唯有兩種論述並進，才能各取所需的撫平國恥所帶來的創傷。⁴⁷在這種論述邏輯之下，一方面成為中國壯大的動因，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成為仇外的報復心理，後者的邏輯在中國民間似乎逐漸成為論述的主流。⁴⁸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西方經濟制裁，讓鄧小平聯想到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⁴⁹但另一方面，鄧小平又認為當時的中國應該韜光養晦，對於鄧小平這種務實的民族主義者而言，百年國恥是中國進步的動力。然而，另一股仇外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卻也在決策圈與民間的輿論當中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在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這或許是鄧小平在韜光養晦之後、要加上有所作為的意義。

(二)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作用

從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來看，今日的民族主義和過去的發展，既有相當程度的連續性，也有著一些不同之處，因此在不同歷史情境當中，民族主義的作用也就不盡相同。學者吳國光就認為，以前五四運動時思考的是如何救國，現在則成了如何使中國成為世界領導者。這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也蔓延到了政治、文化領域，促使中國民族主義轉而在中國內部尋找政治合法性和精神文化資源來支撐所謂中國的崛起。他認為1990年代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並不是什麼政治或知識的懷舊現象，而是目前中國本身轉型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轉型的反映。⁵⁰房寧則認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轉換給了世人深刻印象，表達方式從虛無到自信的話語轉換，理解向度從文化民族主義到政治民族主義的變化。石之瑜則從後現代的角​​度來看，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論述的策略，以因應全球化時代的

⁴⁷ Peter Hays Gries.(2004), p.50.

⁴⁸ Ibid., p.51.

⁴⁹ 鄧小平，(振興中華民族)，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357-358。

⁵⁰ 吳國光，「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變遷」，頁317。

身分流失，今日的民族主義和過去已經大不相同，不但民族主義可以商業化，而且由於其意義紛雜正使得各別中國人心中浮現某種主體意志，自然而然地實踐出身分的能動性，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或滿足於民族主義的需求。在農村的人民可能隨時準備接受政府的民族主義召喚，在城市則可能伺機牟利。⁵¹

至於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產生什麼樣的歷史作用，理論界的基本共識是它一方面促進了民族國家的團結，加速了人類文明變遷的歷史進程，而與此同時，人類又在民族主義這樣一面旗幟的引導下，成為人類災難和不幸的重要源泉，⁵²因此不能忽略的是民族主義具有理性及非理性的一面。程人乾認為，民族主義既能充當構建民族國家，維護或鞏固國家統一和民族尊嚴的保護神，又可能幻化為威脅和破壞國家穩定和統一的破門槌。⁵³劉軍寧則分別對民族主義的長處和優勢作了剖析，認為民族主義是強化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於民族獨立，喚起人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保存民族的文化傳統，同時為政治統治提供了某種合法性基礎。同時也對民族主義的短處和隱憂作了闡釋，並認為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是衝突與動盪的濫觴。⁵⁴王中江認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於正面。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一是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二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系；三是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國家落腳於保衛傳統文化。⁵⁵而這些對民族主義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分析也是學者們看待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及其未來發展前景的基本態度，認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作用關鍵是取決於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如何建構。在許多學者的分析當中，

⁵¹ 石之瑜，「中國民族主義的後現代機緣：國家遷徙歷程中的集體疏離與個體能動」，**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3期（民國91年5、6月），頁1。

⁵² 徐迅認為，自從民族主義進入世界歷史的現代化進程，人類的進步、繁榮、戰爭、大規模的暴行如種族屠殺，大都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以國家權力和國家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徐迅，**民族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7。

⁵³ 程人乾，「論近代以來世界的民族主義」，**歷史研究**（北京），第1期（1996）。

⁵⁴ 劉軍寧，「民族主義四面觀」，<<http://www.sis.pku.edu.cn/wanglian/mzzhy/readings/liujn.htm>>。

⁵⁵ 王中江，「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3期（1993），頁28。

也已經關注到了民族主義所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而這些負面效應的影響力，不單單對中共統治產生影響，更將可能對中國的對外關係產生嚴重的後果。

三、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共外交政策之間的關連性

(一)中共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式

關於外交政策的分析，國際關係學者長期以來一直關心是什麼構成了用於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研究的適當分析層次和單位。如Kenneth Waltz在其國際關係理論經典著作當中，明確的區分了三種層次：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⁵⁶此後，學者們的分析方法依循此原則可以被劃分為兩類，即單層次分析法和多層次分析法。⁵⁷單層次分析法認為應將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輸入項歸於一種因素；而多層次分析法，則主張從多層次多角度來觀察，而非歸於一項特定因素。

1. 中共外交的單層次分析模式

單層次分析法的分析模式應用在中國外交政策分析上，大致呈現三種類型：分別從國際環境、國內因素及個人層次來分析：

第一類型將國際環境看作政策輸入的主要來源，包括國家利益研究途徑、戰略三角研究途徑及國際體系研究途徑等等。這一類型大多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沒有什麼不同，外交政策也受到國際體系的影響和制約，其目的也是為了國家的安全，並且不贊成中國總是以自己特有的歷史眼光，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決定外交政策。⁵⁸這一學派與在西方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學說是緊密相連的，因此往往是以國家為分析的基本單位。如惠廷(Allen S. Whiting)在《中國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一書中，通過對公開材料和政府聲明的研究提出，中國參加韓戰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⁵⁹此外，William Tow在研究中也強調：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⁵⁶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s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3-5.

⁵⁷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5月)，頁38。

⁵⁸ 張清敏，「美國對新中國外交研究近況」，**美國研究**(北京)，第4期(1999)。

⁵⁹ Allen S. Whiting, *China Acros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以來，他的外交政策一直最受到國際政治和安全的軍事理論和以國家為中心的方法影響。⁶⁰

第二類型則把國內決定因素看作是主要決定因素，包括歷史文化研究途徑、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派系政治研究途徑等等。這一類型主張從中共內部找尋外交政策的根源。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引起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的關注開始，在一些學者將研究方向投向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同時，另一些研究中國外交的學者也試圖從國內尋找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⁶¹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認為每一場中國國內政治運動(如1956年的反右運動、1958的大躍進、1966-1969的文化大革命高潮)，都對於中國對待世界產生直接的影響。⁶²石之瑜則從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來理解中共的外交政策行為。⁶³

第三類型則認為中國外交政策最終是在個人層次上決定的，並把它當作分析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層次，如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個人層次的研究顯示了決策者對外部世界和特定國家的認識，影響到中國對該國的政策。在毛澤東時代最受注目的就是毛掛帥模式，如Michel Oksenberg在對毛澤東半個世紀的重大決策分析中就指出，毛澤東在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是最不成功的。

單層次分析模式雖然對於解釋中國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具有相當的價值，但是其分析的模式往往較適合於特定的事件或是年代，而隨著中共進入改革開放，以及冷戰結束國際環境的轉變等等動態的因素的轉變，單層次分析模式無法適應變化的缺陷也暴露了出來。因此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時，雖然單層次分析模式具有對某些事件分析的價值，但是若要更清晰的釐清後冷戰時期中共的外交決策，

Macmilian, 1960), pp.25-29.

⁶⁰ William Tow 著，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台北:聯勤北部印製廠，2003年7月)，頁37。

⁶¹ 張清敏，「美國對新中國外交研究近況」。

⁶² Kenneth Lieberthal,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eds*, by Harry Har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4-66.

⁶³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

似乎就必須加入更多的分析要素及層次，而這也是研究中共外交政策一個新的趨向。

2. 中共外交的多層次分析模式

多層次分析法，源於James Rosenau，他強烈主張運用關聯的分析法進行分析。他提倡一種新的方法，把國際制約和國內決定因素結合在一起作為外交輸入變量，來解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⁶⁴Robert Putnam在1988年則提出了雙層賽局(two-level-game)的國際與國內政治互動的分析模型。而這種跨層次的政策分析模式應用於中國，如廖光生在《中國的排外主義和現代化》一書當中，對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互動關連，作了一番分析並且貫徹全文。⁶⁵Allen S. Whitng對於中共的外交政策分析，則提出了三個因素的互動分析，包括了物質因素、歷史因素以及官僚系統。⁶⁶以上將國際制約和國內決定因素的關聯作為分析外交政策的單位，雖然具有相當大的突破性，但是這種方法仍然會產生一些侷限，因為這種分析方式事實上大都集中於宏觀層次，分析的單位仍主要在民族國家上面，因此並未在微觀層次上充分展開。⁶⁷而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對於其政策模式的分析，更應擴展微觀層面的內涵，因為中共的決策者若沒有毛澤東一般的領袖魅力，勢必將面臨到的是權力的競爭、合法性的追求以及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多方面認知的衝擊，因此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時，勢必不可忽略微觀層次上的動因，亦即中共決策層的互動因素。

關於微觀層次上的分析，主要的焦點放在決策系統研究途徑。史普羅特夫婦(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分析國家外交政策的產出，認為決策者的因素是研究決策過程中的必要條件，惟有加入決策者的因子，整個分析外交政策產出與過程的模型才算完整。他們從認知行為主義(cognitive behaviorism)的觀點認為

⁶⁴ James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pp.251

⁶⁵ 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書局，1988年5月)。

⁶⁶ 轉引自胡祖慶，*當代各國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1年5月)，頁282-283。

⁶⁷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55。

政策的運作過程除了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及運作過程外，也應需加入決策者的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也就是決策者本人在運作環境的限制下所意識到的和認知到的環境。⁶⁸而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分析，1980年代後決策系統研究開始盛行，而其中決策機構研究以及認知研究是決策途徑的兩個面向。決策機構研究強調的是中共外交決策過程的重要性，透過對中共外交決策有關機構組織的研究，分析中共外交決策過程，據以論述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認知研究則從不同層級的中共外交決策制定者、學者與專家的理念著手，來探析中共對外認知，及中共對其他國家所形構的形象，尋找中共外交政策脈絡根源。⁶⁹在認知研究當中，惠廷於1989年出版的《中國眼中的日本》一書，更探討中國知識界和公眾的認知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他透過在中日兩國進行了採訪，探討中國知識界和公眾對日本的想法，提出毛以後的中國外交政策並不僅僅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他極具說服力指出在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中廣泛存在的對日本的不瞭解、誤解、錯誤認識和不信任。惠廷研究是第一次把公眾輿論或者是關心中國外交的輿論，納入到對中國外交政策決策的研究，因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⁷⁰

將微觀層次納入考量，運用多層次分析的方式，趙全勝在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分析，就提出了微觀與宏觀的關聯模式，宏觀層次包括國際制約及國內決定因素的互動，微觀層次則指決策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小群體）。此分析模式的輸入項是宏觀層次與微觀層次互動的動態，至於互動的方式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發生，他將中共外交政策的宏觀—微觀互動分成三個方面來看：⁷¹

- (1) 象徵性的宏觀結構：對應於微觀的決策過程是對環境理性認識的過程，其內涵為世界觀及道德。中共從建政以來象徵性宏觀結構的變化，是從革命到現代

⁶⁸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 41-56.

⁶⁹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驗證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年4月），頁15-18。

⁷⁰ Allen S. Whi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9.

⁷¹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62-64。

化的過程，而這將影響北京對國際和國內環境的解釋。

- (2) 體制機構的宏觀結構：對應於微觀的決策過程是行動的過程，其內涵為外交決策參與的範圍及決策中的規則。中共從建政以來體制機構宏觀結構的變化，是從垂直專治主義到水平專治主義的過程，這將影響中共領導在決策時，必須考量規範以及政治參與範圍的變化。
- (3) 權力、政權的宏觀結構：對應於微觀的決策過程是機構行為的過程，其內涵為權力領域的決策過程以及物質資源的分配。中共從建政以來權力、政權宏觀結構的變化，是從僵硬變為靈活的過程，因此中共微觀決策的過程將考慮單個領導人權力和權威的變動以及政權的合法性等因素。

宏觀—微觀關聯分析模式的特點在於，它不僅把微觀和宏觀層次聯繫起來，而且也分析宏觀結構的三個方面，從而把層次(以垂直方式)和結構(以水平方式)因素都納入考慮當中。並以三方面的宏觀結構包括各種影響和事變，為決策者在微觀層次上作出反應留有空間。

綜合上述的外交政策模式可以看出，中國外交的複雜性和多元性使得要對中國外交從總體上研究和把握變得困難，因而就有了從不同層次對中國外交研究的深入，單一層次分析雖然能夠加深我們對某一因素對中國外交影響的認識，但它往往只強調影響外交政策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個，而且為了突出這一因素的影響，有些觀點難免有些牽強附會，不同的模式之間也往往會互相衝突。因此，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學界趨向於嘗試利用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從多角度和多層次對中國外交進行深入的研究；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外交現象的歸納，而是發展到對中國外交的政策和影響因素的分析。

(二) 民族主義對冷戰後中共外交政策中的影響

從上述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探討，可以發現中國民族主義在冷戰結束後，既然受到了內在與外在環境的影響，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也自然的將會對中國的內

在與外在環境產生反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難看出從中共建政以來，往往運用民族主義的手段，延伸到對外關係上，就是強調反帝國主義等口號，來擴展外交與國際空間，因此將民族主義與中共外交政策作一個聯結並不是陌生的事。冷戰後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分析，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民族主義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如趙全勝認為現代化、民族主義與區域主義是後革命時代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趨勢。⁷²邱坤玄也認為推行民族主義外交是21世紀中共外交策略的一大特性。⁷³而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的對外政策，歸納學者的觀點也可以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來分析。

從宏觀層面來看，國際層面的民族主義互動將如何影響中共的對外政策，正如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國的對外關係取決於他國如何對待中國。學者石之瑜在對於民族主義與外交的分析，則認為在外交政策的實踐當中，決策者往往會在世俗的、物質的國家利益，以及精神的，民族的道德情感當中，尋求一個平衡點。在均衡政策達不到的情況下，政策的擺盪是屬於正常的，以謀求一個最佳的均衡的比例。當其餘世界的國家投入物質的國家利益增加的話，就會帶領自己的國家分配更多資源給物質的國家利益，這將造成各方的民族主義情感的淪落。而若當某一天，有一方發現距離其最佳的均衡比例過遠而先行調整，亦將會引發連鎖反應，誘使各方將資源分配往民族主義的方向調整。⁷⁴

而國內層面的民族主義發展將如何影響中共的對外政策，如鄭永年認為民族主義要發生實際的作用，必須透過機制的運作，沒有組織和制度的運作，民族主義很難影響到政府的政策層面，而這就必須觀察政府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⁷⁵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關聯性的探討，大致關注在三個層面上。首先，是政權合法性這個議題上，如廖光生從歷史事件當中，發現中共政權統治發生危機時，中共領

⁷²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 269。

⁷³ 邱坤玄，「二十一世紀中共的外交策略」，**國策期刊**(台北)，第 161 期(1997 年 4 月 1 日)。

⁷⁴ 石之瑜，**文明衝突與中國**(台北：五南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118。

⁷⁵ 鄭永年，「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頁 37。

導便會轉而求助於排外，利用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來爭取國內的支持。⁷⁶其次，是政府與民族主義的互動上面，如鄭永年認為儘管民族主義是中國政府可運用的資源，但是民族主義運動的方向卻是難以掌控的，因此政府參與管理民族主義的過程，是必須小心謹慎的。⁷⁷第三，則是官方民族主義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上，民間大眾民族主義是對官方民族主義實施的回應，其可能支持但也有可能挑戰中共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宣示，而Peter Hays Gries則認為，民間的論述正逐漸的取代官方的論述。⁷⁸

從微觀層面來看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的對外決策，主要關注的焦點則在於決策者的認知層面，長久以來圍繞在民族主義論述的氛圍當中，這種建構出來的價值也將會根植於決策者的內心。石之瑜就認為民族主義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心理基礎，根據這種心理基礎，才能在對外關係上區分敵我劃清界線，而決策者往往是在物質的國家利益以及精神的民族主義當中，尋找一個最佳的平衡點。Allen S. Whiting則提出三種模式來區分核心決策圈對於外在環境變化時，呈現出的三種不同強度的民族主義姿態。第一主是肯定型(affirmative)：將焦點完全放在將我們定位為具有引以自豪的特性與成就。第二種稱為武斷型(assertive)：此種類型加入了他們的概念，並將他們視為挑戰團體內的利益與認同。第三種則為好鬥型(aggressive)：將特定的外國敵人視為嚴重的威脅，需要以行動來捍衛自己的重要利益。肯定型有助於促進愛國主義以及目標的達成，而好鬥型則會激起憤慨情緒與行為動員，至於武斷型則介於兩者之間。就對外政策隱含的意義而言，肯定形是最低度的反應，而武斷型則是屬於潛在高度反應。⁷⁹

總結以上的觀點，並從宏觀—微觀互動分析模式來看，可以發現民族主義在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模式中扮演的角色，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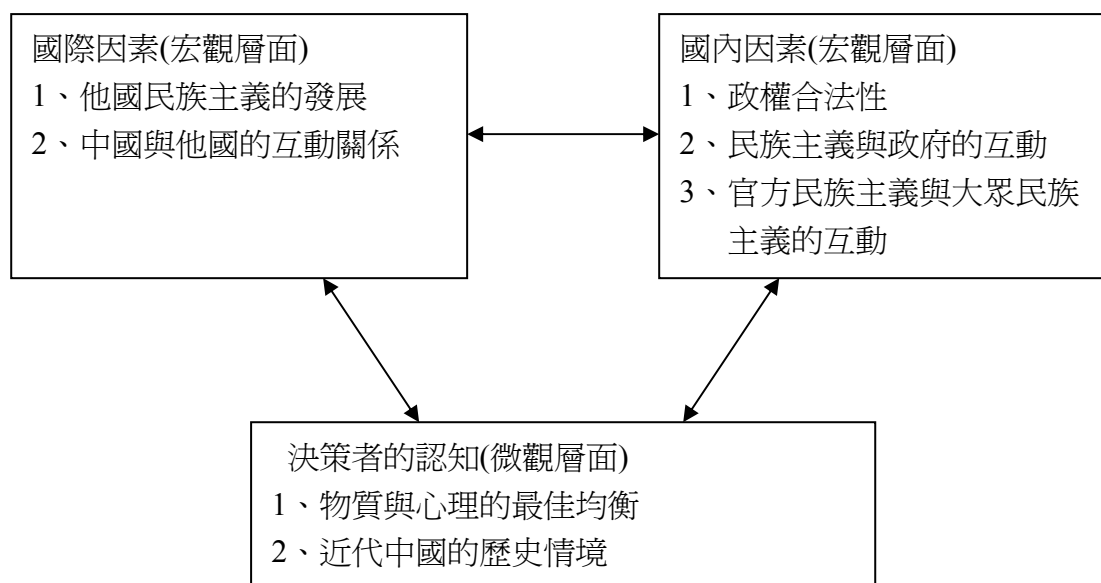
⁷⁶ 廖光生，*排外與中國政治*，頁 292。

⁷⁷ 鄭永年，「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和中國的國際關係」，頁 445。

⁷⁸ Peter Hays Gries.(2004), p.50.

⁷⁹ Allen S. Whiting.(1995), pp.295-297.

圖二、 民族主義在中共外交政策輸入層面的角色：



資料來源:自製

由上圖可以發現民族主義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是一項國際環境、國內因素和決策者認知的互動過程，而國際環境、國內環境及決策者認知根據學者的觀點，大致有上述的一些內涵因素，而三者之間是如何互動影響外交政策以及中日的互動關係，將是本論文研究探討的重點所在。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架構

研究中國大陸問題，根據過去郭華倫老師與美國學者辯論時的觀點，他說研究中國問題，要先了解中國的歷史背景與黨政發展，研究的途徑應該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不能因為西方人看似一套普世適用的真理，就可以拿來研究中國大陸。⁸⁰而關於外交政策與民族主義的分析模式，西方學術界所佔有的主導地位是不容否認的，一些主流的觀點也相當具有價值，但是對於具有的獨特歷

⁸⁰ 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台北：政大國際關係問題研究中心，民國 65 年)，頁 131-168。

史及心理情境的中國來說，中國所具有的不同之處也是必須注意的。因此，本文在研究途徑與架構形成上期望能在享受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時，亦能考量中國所具有的獨特背景。

一、 研究途徑

在研究中共外交政策這個議題上，學界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分析模式，每個分析模式各自有其分析的特徵與關注的變數，隨著中共黨政歷史背景的發展，分析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變數也有許多的改變，因此根據時代背景的不同，各種模式也將有不同的功用。冷戰後多層次的分析方式盛行，加上中共的外交手段逐漸變的靈活且多元，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的分析時，要用單一理論來解釋多面向的發展是極為困難的事，因此從多層次的理論分析方式，似乎提供了一個分析中共外交政策認知上較為周延的可能。

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因素:如中日關係的互動及民族主義互動；國內因素: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政策認知層面，⁸¹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

而研究中共民族主義，本論文則採用諾布所提出的分析模式，並歸納學者的分析，諾布認為民族主義有三個主要的成份，即政治理念（或是意識形態）、經濟利益與傳統（傳統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處於危機中的運動，使得這三個成份結合在一起而形成一個複雜的複合體。而所謂的危機情境不單單只是在於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所普遍具有的反帝、反殖民意涵，更深刻的涵義需將之放入不同國家的歷史情境當中，透過不同國家面臨的危機以及反應方式的分析，才能尋找出適合的民族主義理論。基於以上的認知，中共民族主義在冷戰後興起，應從中國

⁸¹ 決策過程研究由於牽涉範圍擴及其權力結構的黑箱子，這部份的資料在取得以及判別上並不容易，因此在此決策層面只涉及對於認知層面的影響。

的危機情境來觀察，在這危機情境之下，將會造成意識型態與傳統文化的融合，進而與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利益困境相結合，影響中國的領導階層以及知識份子，一個階級一個階級的逐步傳播，最終將遍及整個社會而形成政治意識。當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產生後，勢必將產生實際的影響，影響到政策層面。

二、 研究架構

中國與日本的雙邊關係複雜而多元，影響中共對日外交決策的變數也相當多，但其中一項敏感的因素，就是民族主義的因素，中日雙邊關係趨於冷淡與認知上的差異，也往往是根源於此。而冷戰後中共對民族主義運用，呈現的是一個復興的動能，影響所及，也將擴展到對日外交政策層面影響雙邊關係的發展，因此本文在議題範圍上，主要偏重於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義因素探討。而基於上述之文獻回顧及研究途徑所構成的框架，本研究在章節安排上如下：

第二章 根據民族主義的分析模式，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國復興，具有國際及國內的環境轉變所導致，而為了更深刻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在此將探討國際及國內環境具有哪些程度的轉變。此外，冷戰後民族主義中共民族主義展現出了不同於過去的特點，本章除了將探討這些特點之外，亦將探討民族主義在中共國家戰略中的角色定位。

第三章 探討冷戰後日本民族主義興起與發展的意涵，以及針對中國的問題。針對中日雙方在民族主義議題上的對立，本章試圖從博弈分析的角度來分析，中日民族主義對立產生的影響，以及博弈所產生的困境化解之道。

第四章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特色與興起的過程既有別於以往，其所產生的影響力也與過去不同，在影響中共對日外交當中，民族主義透過國際及國內層次因素與決策的認知的互動影響，在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層面均產了不同的作用。因此，本章將試圖從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的層面，綜觀民族主義因素在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中扮演的作用。

第五章 中日關係在冷戰結束後迄今仍未達到一個穩定的結構狀態，國際國內環境的轉變影響，加上雙方民族主義的興盛與對立發展，冷戰後中共的對日外交政策發展既有轉變亦有持續，本章除了將探討這些轉變與持續，亦將分析與評估中共在其中尋求平衡的方式。

